

与启动之初,民政部官员到场支持,央视《星光大道》节目频频倡议,陈坤、李玉刚等明星义演募捐的喧哗相比,“星光专项基金”的终结显得异常低调,主管单位只是在其官网项目介绍中加了“已结束”三字。没有相关报道,连发起人都不知其已不存在。

记者调查发现,这个共募集140万余元资金的基金,管理费、行政及人员支出近86万。有公益界人士称,该基金折射出我国慈善专项基金管理混乱、监督失效、追责机制不健全的现状。事实上,这个基金存在的不到两年里,外界难以获知其募款多少,用在何处。

熄灭的希望

陈银华绝望了。这个晒得皮肤黝黑的重庆汉子咬着牙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女儿说,“走,咱们回去。”

陈洪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15岁的她出生时因缺氧导致脑瘫,被认定为二级肢残,15年来,陈洪大多数是躺着度过的。

今年7月,陈银华带着女儿和家中仅有的5000元积蓄,又借来5万余元进京治病,他们找到武警总医院。

陈洪的母亲常年患病,全家仅

靠陈银华维持生计。他掰着指头算,每晚15元的陪床费太贵了,他一直睡地上,靠吃泡面充饥。在京14天,生活费只花了500元。

带来的钱还是没了,全部用于陈洪的腰椎穿刺手术。医院建议继续留院休养,陈银华狠心拒绝。

回去,意味着陈洪可能一生都再难有好转的希望。

“这些家庭真是挺难的,只可惜基金用不了了。”陈银华的遭遇,让安沂华又念叨起“星光专项基金”。

事实上,安沂华提到的星光专项基金,就是为那些脑瘫患儿设立的。

2010年11月,一则“双胞胎脑瘫姐妹急需救助”的新闻,引发社会关注。安沂华回忆,医院免除了两个孩子的部分手术费,他和同事也捐出了部分奖金。

转机随后出现,央视《星光大道》栏目组听闻此事,来医院看望这对姐妹。之后,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(后改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,简称福基金会)副理事长张仲,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(简称关工委)“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”执行主任宁密、副主任马佳年分别找到

不透明的基金

儿慈会官网显示,“星光专项基金”管委会成员共有5人:主任宁密,副主任姜莹、安沂华、杨大伟,执行主任马佳年。

“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个副主任身份”,看到记者拿到的“星光专项基金”立项决定公告,安沂华非常吃惊。

同为管委会副主任的姜莹说,她既不认识安沂华,也不知道杨大伟,“没有接触过,也没见过面。”

“如果成员之间不见面、不接触,怎么决定基金的使用?”北师大珠海

基金运转不到两年资金告罄;管理费及行政、人员支出超募集现款一半

管理的混乱和监管的失效,最终带给“星光专项基金”的是天亡。

儿慈会官网公示,“星光专项基金”募集总额221万余元,其中包括价值67万余元的物资。支出款物总额226万余元。

公示并未注明基金结束时间、款项来源及具体用途。

根据协议,儿慈会和“星光专项基金”按照募款总额的10%收取管理费,其中5%由儿慈会用作管理经费,5%作为星光基金管理经费。

但儿慈会提供的一份粗略账单

专项基金乱象丛生

记者调查发现,早在“星光专项基金”设立之前,宁密和马佳年以关工委“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”的名义在福基金会已设立过“早产儿救助基金”,2011年又以同样的名义设立了“星光专项基金”。

“我们怀疑马佳年把这两个基金的钱串着用。”福基金会某负责人表示,“早产儿救助基金”与“星光专项基金”用途有重叠部分。

“宁密在这里没有任何职务”,今年8月,关工委教育中心主任黄浦透露,关工委“教育发展中心”早在2010年3月31日已经取消,教育中心是在2014年5月15日重新登记注册

的。

“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不是法人机构,原则上是不能和我们签协议的,但当时福基金会成立不久,被钻了空子”,福基金会项目部副主任刘芳说。

“宁密自称是关工委的,我们也没有去怀疑”,儿慈会秘书长王林说,他至今保留着宁密和马佳年递给他的带有“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”字样的名片。

马佳年在多个公开场合自称“早产儿联盟”创始人,该组织为“国际范围内最大的早产儿组织”。记者在中国社会组织网查询发现,早产

这位武警总医院干细胞移植专家说着说着就拍了桌子,“这个基金是武警总医院参与发起、专门用来救助脑瘫患儿的慈善基金,光我知道的就收了一百多万捐款,可我们只为两批14名患儿申请下来共25万元,其余的都没影了。”

来自甘肃兰州的14岁脑瘫患儿祁艳婷,曾一度接近星光专项基金。

2011年7月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祁艳婷在武警总医院花费5万多元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。此时,她的

金”以“挂靠”形式成为福基金会名下的专项基金。基金成立现场,在民政部官员和陈坤、李玉刚等影视明星助阵下,发起了针对该基金的拍卖和募捐。公开报道显示,截至当年10月31日,基金共募集善款140万余元。

2011年7月26日,福基金会,关工委“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”和安沂华共同签署“儿童星光基金(项目)合作协议”。

协议显示,三方约定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,成员包括张仲、安沂华、宁密、马佳年及武警总医院医生王晓东等7人。各方共同提出项目方案,报基金会同意后,由管委会根据项目进度

终未公开过详细账本。

2014年2月25日,儿慈会下发的《关于终止星光“窝梦”基金协议的决定》显示,2013年6月,儿慈会发现“星光专项基金”资金告罄,遂决定终止该基金协议。

在这份终止决定中,儿慈会罗列了“星光‘窝梦’基金”工作缺乏规划、拖欠借款、员工管理不善、拖欠基金会费用等七个问题。

宁密、马佳年签字确认了这份决定。然而,项目早已终止,作为原始发起人之一的安沂华一无所知。

金项目人员,副主任、主任签字后到基金会财务签字即可放款。

“只要不是大额的,宁密签了字,拿到我们财务就能取走钱。”姜莹说,儿慈会在对“星光专项基金”支出的监管,仅限于马佳年来报账时提供的账户是对公账户而非私人账户,至于钱给谁用,项目究竟是否真实,儿慈会并未去核实。

“没有从基金里面拿过一分钱,甚至没有报销过一分钱油钱。”8月11日,宁密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自己只负责为发放善款签字,很少拒绝签字,具体的资金使用情况,宁密称只有马佳年清楚。

“现在确实是在脑瘫方面用得

儿联盟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,根据《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》规定,未经登记,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属于非法民间组织。

多名曾跟随马佳年做公益的志愿者称,此前,马佳年募资两亿元建早产儿医院等多个项目计划均告失败,大概从2012年起,她已基本不做实际的救助工作,只是在做宣传和办活动。

记者多次请求与马佳年见面,均被其推辞,对于管理混乱、账目收支、运行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,马佳年称自己不知道,“我只是做事的,你还不明白吗?”

家庭已拿不出一分钱,连药都吃不起。后来他们听说了星光专项基金,并递交了申请材料。

4年过去了,祁艳婷还在等,原本手术后已经学会站立的祁艳婷病情已再度恶化。

“现在光是睡,也不能坐,感觉快没希望了,”祁艳婷的母亲仍旧想着基金能够发放。

武警总医院统计,像祁艳婷这样的递交过申请材料却还没有得到救助的患儿,至少还有73名。

报基金会审核支付费用。但王晓东表示,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一身份。

“儿童星光基金”成立两月即转至儿慈会。福基金将此前募集到的140万余元转给儿慈会时,曾在捐赠协议中明确,这笔善款继续用于脑瘫儿童和孤残儿童救助等工作。但在宁密与儿慈会所签协议中,基金宗旨变成了“开展有关早产儿疾病救治和贫困、残疾等青少年弱势群体的医疗和相关知识普及和救助活动”,脑瘫患儿未专门提及,基金用途也被放大到救助打工子弟幼儿园等项目。

姜莹称,儿慈会与宁密签署的协议,内容系宁密自行填写。

2012年5月,马佳年最后一次从武警总医院拿走了30份脑瘫患儿申请材料,此后再无音讯。

“我们去问,马佳年给的回复是没有人捐款,基金需要‘保底’,给不了。”王晓东说。而基金所有资金告罄是在2013年6月。

也就是说,2012年5月31日武警总医院第三次申请救治款时,基金的账上有钱,但没有人给他们放款。

“基金会对这个基金的监管确实存在问题。”姜莹在接受采访时坦承,他们的监管失效了。

不多”,宁密承认,捐款人没有明确说善款要用于脑瘫儿童,所以只要用于公益活动就没有问题。

“我只是个做事的,钱怎么花,我不负责。”7月28日,记者向“星光专项基金”执行主任马佳年求证善款用途、资金管理方式等问题,她均以此作答。

资深公益人士,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人才让多吉认为,星光专项基金管理费远远超过协议规定的10%,只能说明儿慈会对基金财务管理内控失败。此类情况可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大队进行举报。若情况属实,可对基金进行警告,甚至撤销基金会的处分。

8月10日,在福基金会办公室,记者再次向马佳年求证上述问题,对方拒绝给予详细回答。“不要再骚扰我”,最终,在交谈不到10分钟后,马佳年起身离席。

另据了解,2013年前后,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从捐赠收支等5个方面对16家基金会的244个专项基金进行了监测,结果显示,只有18%的专项基金通过基金会或自建网站公开了相关信息。

“必须得有个说法!”安沂华表示,他已准备联系律师,前往儿慈会“查账”。

(本报综合)



儿慈会官方网站上,“星光专项基金”显示“已结束”。

“星光专项基金”缘何夭折